

# 平江文史資料

第十輯

岳增瑜資料專輯



# 平顺文史资料

##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平顺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七月

封面题字：何贵林

封面设计：曹建考

平顺文史资料

第十辑

(内部刊物·请交换)

---

**编辑** 政协平顺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 平顺县印刷厂

---

1999年9月印刷

## 前 言

本辑《平顺文史资料》，专辑刊载了学生领袖岳增瑜的史料。

岳增瑜是我县石城镇老申交村人。他曾在本世纪的二十、三十年代，于中国革命的初期，积极追求革命，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并组织领导了1931年12月的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在抗日战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当时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在“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从北平返回家乡，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组建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他的勇敢、坚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大智大勇的风范，在平顺、长治一带留下了广泛的影响，至今他的事迹还在这一带传颂。但是，由于当时斗争复杂，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岳增瑜同志被错误杀害。虽然当时就有人组织请愿和营救，也没有能够将这一错案纠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岳增瑜同志的妻子及子女又一次向山西省委、中央领导提出申诉，在中央领导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经山西省委复查，于岳增瑜同志被害50周年之际，予以彻底平反。还岳增瑜同志以本来面目，也给当地群众的期盼以满意的答复。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党有错必纠的优良作风。

今年正值“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岳增瑜同志遇难六十一周年，我们刊登岳增瑜同志的史料，以深表对“五·四”运动的

纪念,发扬光大“五四”运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学习岳增瑜同志坚定的革命立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编 者**

1999年6月

## 政协平顺县第五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刘文科

副主任:马有轩 杨金堂

委 员:申俊达 张云清

### 《平顺文史资料》第十辑编辑人员:

编 审:何贵林 许文明

编 校:刘文科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岳增瑜简介.....               | (1)  |
| 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团报告.....      | (5)  |
| 忆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 .....         | (69) |
| 我了解的岳增瑜的情况 .....         | (75) |
| 王敏挺、黄文一给岳云霄的一封信.....     | (79) |
| 我所知道的岳增瑜的情况 .....        | (81) |
| 回忆对岳增瑜的见闻 .....          | (82) |
| 吴廷璆给岳云霄的信 .....          | (83) |
| 关于岳增瑜的证明材料 .....         | (85) |
| 关于岳增瑜在北大时期的材料 .....      | (86) |
| 关于岳增瑜的传闻 .....           | (87) |
| 岳增瑜不可能是托派分子 .....        | (89) |
| 我所认识的岳增瑜 .....           | (90) |
| 王中青与张慕陶见面情况 .....        | (91) |
| 关于和托派头子张慕陶的接触问题 .....    | (92) |
| 王中青与托派张慕陶的关系 .....       | (94) |
| 致薄一波同志的信 .....           | (96) |
| 薄一波同志的批示 .....           | (97) |
| 中共中央组织部给山西省委组织部的批示 ..... | (98) |
| 关于岳增瑜历史问题的平反意见 .....     | (99) |

|                                         |       |
|-----------------------------------------|-------|
|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关于岳增瑜同志因“托派”问题被错杀的平反结论》 ..... | (101) |
| 岳增瑜给原庭兰的一封信 .....                       | (106) |
| 我们全家为我父岳增瑜申雪之经过 .....                   | (107) |

## 岳增瑜简介

岳增瑜，字怀瑾(1905—1938)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老申交村人。

山西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三十年代学生运动的领袖。

他出生在我国封建社会没落时代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就勤奋好学，嫉恶如仇，许多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就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五四”运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宣传进步书刊和革命道理。在山西省第四中学时就担任学生会主席，领导学生搞学潮罢课游行，曾被阎锡山通辑。

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上学期间，由于经常到图书馆看书，认识了李大钊同志。在李大钊同志的直接教育和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同志被捕那天，岳和一些同志正在李家(俄国公使馆内)开会，突然听到在外放哨的李夫人和女儿喊：“快！快！有情况……”岳和一些入翻墙跳到俄国兵营，可李大钊和其他几个人还没处理好文件，就被荷枪实弹的军警给抓走了。

岳增瑜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仍然继续学习马列，宣传革命道理，活跃在学生中间。1928年纪念“二七”大罢工游行时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在党的营救和蔡元培先生(当时的教育长、北大校长)的保释下出狱。当年反动学阀李石曾把北大改为学院，岳增瑜等为了维护北大在世界上的荣誉，领导学生进行斗争，终于在1929年恢复原校名。1931年9.18事变

后,中华民族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9月20日发表宣言,提出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给日本帝国主义以直接的打击的号召。北平党团市委于12月初,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活动,组织各大专院校,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全国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表现了极大的义愤,以岳增瑜为首的一些同学,召集北大同学开会,组织了“北大南下示威团”,推举他为总指挥。12月5日,他与王俊奎、千家驹、赵作霖等同志率领北大学生三百多人到南京示威,在北京、济南、南京等地发表演说。呼吁群众组织起来,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在南京,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在军警捆绑同学们的时候,他挺身而出。高喊:“你们把同学们放了,由我总指挥一人负责”。在孝卫陵关押时他又领导同学们进行绝食斗争。在此学生示威运动的带领下,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迫使蒋介石宣布下野。在31年12月,北大成立了非常学生会,选举岳增瑜为主席。32年毕业后,公开身份留校任教。并兼任中国大学讲师,实际搞地下工作。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后。岳积极组织参加12.9爱国不升运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白色恐怖,使他在北平无法安身,经改扮取道天津、青岛、郑州,准备去延安。但郑州封锁不能西行。返回太原。经史纪言、王中青、赵树理等邀请回上党搞抗日。在平顺他和县牺盟会取得了联系,积极参加了牺盟会的工作,他还主动和当时长治乡村师范校长史纪言,教导主任王中青,平顺北社镇小学教师曹述敬等人共同商量组织抗日游击队问题,并亲自到平顺县西社村曹锦章家(原北平朝

阳大学学生)动员其父交出手枪,一起去打游击。

1937年秋,托派分子张慕陶被阎锡山任命为“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总指挥,到长治组建队伍。当时在长治乡村师范担任教导主任的王中青,在同张的接触中谈到岳增瑜在平顺组织游击队,他让王去找岳,岳到长治后,相随史纪言、王中青、杨蕉圃等人去见张慕陶,一见面岳增瑜便说:“我听说你是个老托”。张慕陶说:“什么老托不老托,有些组织有钱,能开展宣传。便被人家说成是老托,应该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希望岳增瑜及乡村师范和他合作。岳增瑜对他说:“张先生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是已信仰共产主义,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和领导。你是老托,在华北也颇知名,是信仰托洛斯基主义的,这我们就是背道而驰,不能合作的……”。1938年旧历2月,平顺县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司令部,县长王宝山任司令。牺盟会特派员霍励民任副司令,岳增瑜任总队长,组成了平顺县的抗日武装。

1938年初。由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主义,平顺县的国民党政府惧敌携巨款南逃至平顺赵城村。因县长甄冥庭扣压公安队员的薪晌,被公安队员开枪打死。这就是所谓的“赵城事件”。公道团团长田成绪在赵城自任县长(当时岳增瑜在老家老申交村,距赵城村有二百里路)平顺县牺盟会和全县各界人士极力反对,经各方会议提出选举县长。岳增瑜和全县各村代表选举了县牺盟会特派员霍励民同志为县长。其后在豆口村发生了八路军游击队,连长被谋杀案,县政府请岳去侦破缉拿凶犯,岳刚到石城村就被扣压。送至长治。被囚在长治县“监狱”以“煽动警察抢钱谋杀县长的汉奸罪”上报阎锡山的省政府批准,在长治被杀害。而这个罪名是把别人干的事加在岳增

瑜头上,实际上此事同岳增瑜毫无关系。当时长治及平顺就有数千人联名保释,为其喊冤。但因时局动荡,斗争复杂,被诬为“托派”。以“汉奸罪”而遭不幸,时年仅 32 岁。

(刘文科)

# 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团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 一、前 言

这次北大同学在南京作英勇的反帝斗争，遭受政府残酷的武力压迫，引起了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太原各地蓬勃的反日运动，终结了十二月十七日南京政府对学生的的大屠杀。这个运动虽因帝国主义者代理人的无情惨杀而暂时消沉下去，但它的浪潮已震动了全国民众的心弦；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这种口号变成了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但因这次运动的主力军，只局限于知识阶段的大学生，未能深入的进入到劳苦民众中去，所以一遇到统治者的枪炮和刺刀就不免于惨败；然而，只就这一点看，亦足以证明：即使是知识阶段大学生的革命斗争，也已经使得南京政府手忙与脚乱，已经使得帝国主义者受到空前的威胁。（伦敦泰晤士报，上海大陆报、字西林报一致鼓吹中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手段对付学生。）如果说，北大的示威运动是由学生合法的斗争（请愿）进到革命斗争的第一个转变；那么，由大学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进入到劳苦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第二个转变，是必然会产生的。同学们，奋斗吧！

## 二、出发前一天的全体学生大会

自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三省以来，北京大学召集过三次全体学生大会。第一次是九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为十一月十日；第三次即南下示威团出发前一天的十一月三十日。前二次都是由学生会自动召集的，这里我们须记得：北大的旧学生会是在所谓忠实同志操纵下的东西，耳熟能详的关纾便是旧学生会重要的角色。忠实同志底主要目的，决不是发动一个真正的反日运动，而只不过欺骗同学，敷衍门面，表示北大的学生都在他们领导之下，以便到党部或机关领取津贴。所以第一次大会学生会请了一些所谓名教授——胡适、何基鸿、陈启、燕树棠、陶希圣——讲演。名教授讲演原来是反日运动之一部分，这不能不说是胡圣人“读书救国”论的收获。但是北大同学究竟不是如忠实同志们所预想的那么简单，所以第一次大会当主席（蒋校长）致辞后，立刻有同学提出变更议事日程，取消教授讲演，讨论对日方略。提案被同学热烈所拥护，教授讲演是取消了；然而当讨论方案时，因同学们的意见分歧，主席又始终不肯把罢课问题正式提出讨论；同时同学与教授间亦有执拗的种种急辩，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第二次大会是在日人收买流氓袭击天津的第二天，学生会决定了全体同学应到顺承王府对张副司令叩头请愿去。“请愿”，也是忠实同志预定要排演的滑稽剧，因为他们对统治者要表示其驯良，同时对同学又要维持其爱国的假面具；既可乘此机会对政府表示殷勤，又可作自己终南之捷径，这样一举而四得的事情，是当然要提出通过而且执行的。果不其然，那天“请愿”的结果据学生会代表说是：“答复满意”，“尽欢而散”！（见十一日各报）请愿回来，学生会召开一个大会，但因人数过少致未开成。此后，北京大学

整个的反日运动便鸦雀无声，不闻有所动静。“北大已经死去”的讥评几成盖棺论定的事实。然而，北大同学因过去历史的环境，是富于革命性，接受新思潮，且往往站在一种运动之最前线的。只是因为北大学生会是在御用同志掌握中，所以整个的北大在反日运动上毫无所表现，但是自发的，由同学们自己组织的反日团体却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而风起云涌地前后成立。等到十一月十六日，国联再度集会时，国际的局面有一个陡然的转变，英法美与日本成立了一个谅解；由日本在远东作反苏联的先锋，实行武力干涉的准备；各帝国主义强盗则对日本在东三省的暴行表示默许，国联公开地揭破他的假面具与日本取一致行动来宰割中国，同时中国政府则决定了屈服。这时同学们再不能沉默下去了，他们对忠实同志的抗日会（由学生会所组织）表示其充分的不满。于是就由二百数十名同学之签名要求召集大会，忠实同志虽想多方面的破坏，然始终敌不过同学们反日的高涨情绪，不得不于十一月三十日在三院大礼堂召集第三次全体学生大会。开会以前，忠实同志们在各斋舍贴满了“严防共党捣乱”的标语，以作钳制同学们提出革命的反日口号的准备。会是在下午一时开的，会场中充满了悲壮激昂的空气，“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利益”、“反对政府哭诉国联的外交”、“反对在锦州划中立区”、“反接收国联议案”、“反对与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勾结”等提案都被热烈地通过。最后决定到南京去“示威”，决定了“倘政府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以武力驱逐日军出境，不能保证中华民族之独立时，则非不但不信任化，而且要打倒他！”当通过这些提案时，有几个被收买的流氓与走狗大喊其“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但同学们革命的空气到底克服了走狗的捣乱。最后讨论罢课

问题时，走狗们忽然提出人数问题来，以人数不足，不能解决这样重大问题为辞来反对罢课。这种不成理由的借口，同学们是不受他的欺骗的，因为何以通过别的议案不发生人数问题，而独于提到罢课就有法定人数问题发生呢？所以大家一致主张继续讨论，不要理会他们的反对，走狗们见反对不成，遂实行退席，但看见退席后我们还继续开会，于是三个最无耻的流氓，遂施行其最卑鄙最下流的手段，退出大会后，由外面拾起石子及煤块由窗子中打进会场来，煤块飞起，同学朱孟祥君，血流满面而昏绝了。同学们除把朱君抬往德国医院，全体坚持非讨论完结不可！“罢课”与“改组”抗日会”遂在同学全体一致可决之下被热烈地通过了。这次大会使我们认识了：御用的忠实同志是什么东西？他们口口声声喊严防共产党捣乱会场，原来不过是便于他们操纵的把戏；若操纵不成，则他们自己就是无耻的捣乱者。

这次大会是有它重大的意义的，它通过了三个重要的决议案：

一、北大全体同学南下“示威”，“示威”与“请愿”不仅是名辞上的差异，而是完全不同其政府意义的运动。“请愿”表示对现状的盲目，对政府无望的依赖；“示威”则是表示人民的力量，给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以一个威胁；并且要进一步来做唤起民众的根本工作，以为挽救中华民族出于沦亡的唯一出路。大会中不仅通过了要南下示威，且决定于第二天出发。

二、即日起罢课，扩大反日运动。

三、改组抗日会，并停止其一切活动。过去的抗日会非但丝毫没有反日工作的表现，反当了统治者阶段的走狗，专以钳制同学之反日运动为能事，应立即取消其存在，并停止它的活

动。

十一月三十日的大会是北大复活的象征，是北下南下示威团参加人活生生的反日斗争的先声！它表示北京大学并没有死去，北大的精神还蓬蓬勃勃的随着时代潮流进展着！

### 三、出发前的准备和南下的途中

十二月一日上午九时，我们在北大第二院大礼堂召集了一次南下示威同学的大会，决定定名为“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团”，由大会产生一代表团，代表团分文书、交际、宣传、纠察、总务五股。当场推举岳增瑜、刘松云、赵作霖、吴廷璆、张文佑、王敏铨、邹科嵩、扈文章、刘钺、张景博、钱万选、杜毓沅、李金凯、张孟休、靳瀛、王俊奎、郑新圃、徐运元、孙钟岳十九人为代表团代表。示威团定下午三时在一院大操场集合，向东车站出发。出发前由代表团根据昨日大会精神及决议准备南下示威“告民众书”，在火车中印发。会开完了已是十一点三刻；出发（三时）以前，我们要准备好了旗帜、徽章、印信、符号。我们一方面要和学校商洽经费，一方面要草就宣言。于是代表团立刻把职务分配好，全体总动员起来，刻图章、写袖章、印名片、做旗帜，交际股立被派往与学校交涉，文书股临时聘请千家驹写就南下示威宣言，限他下午二时以前交卷。谁也没有功夫吃午餐，谁也不能把一分钟虚闲过去。在三点钟以前，所有的东西差不多准备齐了。油印机、竹竿子、颜色纸、白布、墨汁，都向学校备了来，准备在车上写标语、印宣言。只是经费，还有一点没有办法。学校当局绝对反对我们南下，因为当天蒋校长接到教育部来电：“报载北大学生将全体来京请愿，务须设法制